

两年前,一家权威报纸披露,1995年全国公款吃喝1000亿元。一时舆论哗然。然而,一些与公款吃喝一样吞噬民族民膏的黑洞,尚没有为国人所关注。

《中国经济时报》载文指出:“改革开放以来,中国资本外逃在650亿至850亿美元左右,近年资本外逃保持每年近100亿美元的规模。”

100亿美元!这是个什么概念。以现在的汇率计算,相当于870亿元人民币。12亿中国人,每年每人白白付出72.5元。这么多资金飘洋过海,落入了外国人和中国少数私人的腰包!

从经济角度去分析资本外逃的恶果,一是加剧了资金短缺的矛盾;二是加剧了国际收支的困难,影响我国加入世贸组织;三是加剧了民族经济地位。如果从政治角度去分析,这是不是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腐败现象?国有资金外逃如此猖獗,社会主义大厦的墙脚如此被大肆挖掘,后果能不令人堪忧?

国有资金是通过什么渠道,是什么原因外逃的呢?其原因有三:一是中国对境外企业经营管理缺乏经验;为资本外逃开了方便之门。由于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,开低价和高价发票、向国外合伙人付“佣金”、资金倒换、现金转移等等这些五花八门的“飞越国”手段屡见不鲜。二是某些投机分子存心利用金融迷官,以便化公为私。这里有一句行话,叫做“洗钱”。国家的钱

深圳特区在发展,特区的乞丐似乎也在“发展”。

在人民桥、东门市场、国贸、国商等商业、金融区,或拦拦行人,或沿商店乞讨,如遭训斥,胆大的乞丐还反唇相“辱”。乞丐已很少单打作战,往往三五成群,前后呼应,相互帮衬、壮胆。

不要问我从哪里来

特区之特,除发展经济的政策优惠外,还用铁丝网圈了起来,必须有公安机关填发的特别通行证方可进入。乞丐“一无所有”,冲破铁丝网或在海边溺水而死。

武警广东省第六支队一位湖南籍战士说,乞丐最头痛,罚款没得,收容,给碗饭吃。加之蓬头垢面臭烘烘的,谁都不愿理他们。城市管理人员也有同感。于是,乞丐就我行我素起来。

在寺庙商店乞讨好发“财”

西丽湖公园的西丽塔下,有一座小庙,游人如织,善男信女不少。即使不信佛的靓女俊男也想在此讨个吉利。于是,乞丐云集在那里。

瞭望哨

□文/黄钧

一、行业竞争。国有、民营的各大公司,以及外商对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资金投入连年增加。目前国有两家房地产公司,中外合资企业已达4000余家,外商独资房地产企业达800家,同行间竞争白热化。

二、市场竞争。现在除了开发商外,还包括房地产中介、咨询、评估、代理、法律、公司、策划、广告、媒体等行业,无一不行业都要从中分一杯羹。

三、资金竞争。国家的住宅产业开发尚处热点,在大力推广中,政府的政策对住宅产业开发的资金调控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。

四、服务竞争。当前房地产营销由原来的坐等客上门,发展到出门找客、服务上门,并且增多服务范围、方式、内容等。

五、时间竞争。在同等条件下,时间短、收效快的项目,才有利可图,开发商不得不看重。

六、人才竞争。房地产业为了发展,愈来愈多地重视和重用人才,由单纯利用本地、本单位人才发展到向各地大中院校、科研院所聘请“能人”。

七、信誉竞争。“利从信誉中来”,房地产业由原来的客户登门提意见,甚至上诉法院,变为主动征求客户意见,并进行跟踪服务。

八、宣传竞争。房地产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愈发重视形象,并逐步向集艺术、新奇、娱乐于一体的宣传方向发展。

九、科技竞争。伴随着科技的推广,大批高、新、精的技术在开发企业中得到广泛应用。

十、信息竞争。房地产企业要有一支信息专业队伍,利用计算机技术和现代通讯手段,建立房地产业信息网。

春节,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,毛泽东也忘不了这个节日,并留下了许多佳话。

毛泽东在湖南韶山度过了他的少年时期。在这里,他不但吸收了儒家奋发向上、兵家尚武精神,而且从父辈那里接受了乡风民俗,尤其是春节,他是一点不会忘记利用这个节日和部下联络感情的。

“洗”来“洗”去,就转移到个人帐下了。正如某书所言“尤其现在的银行已经高度国际化、复合化。货币以电子的形式,在各大洲之间往来。一笔钱进了这样的‘迷官’之中,就像脏衣服进了洗衣机一样,化、复合化。到了这个时候就已经是‘干干净净’的了。”这里的“干干净净”就是“洗”了。

从经济角度去分析资本外逃的恶果,一是加剧了资金短缺的矛盾;二是加剧了国际收支的困难,影响我国加入世贸组织;三是加剧了民族经济地位。如果从政治角度去分析,这是不是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腐败现象?国有资金外逃如此猖獗,社会主义大厦的墙脚如此被大肆挖掘,后果能不令人堪忧?

国有资金是通过什么渠道,是什么原因外逃的呢?其原因有三:一是中国对境外企业经营管理缺乏经验;为资本外逃开了方便之门。由于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,开低价和高价发票、向国外合伙人付“佣金”、资金倒换、现金转移等等这些五花八门的“飞越国”手段屡见不鲜。二是某些投机分子存心利用金融迷官,以便化公为私。这里有一句行话,叫做“洗钱”。国家的钱

深圳特区在发展,特区的乞丐似乎也在“发展”。

在人民桥、东门市场、国贸、国商等商业、金融区,或拦拦行人,或沿商店乞讨,如遭训斥,胆大的乞丐还反唇相“辱”。乞丐已很少单打作战,往往三五成群,前后呼应,相互帮衬、壮胆。

武警广东省第六支队一位湖南籍战士说,乞丐最头痛,罚款没得,收容,给碗饭吃。加之蓬头垢面臭烘烘的,谁都不愿理他们。城市管理人员也有同感。于是,乞丐就我行我素起来。

在寺庙商店乞讨好发“财”

不要问我从哪里来

特区之特,除发展经济的政策优惠外,还用铁丝网圈了起来,必须有公安机关填发的特别通行证方可进入。乞丐“一无所有”,冲破铁丝网或在海边溺水而死。

武警广东省第六支队一位湖南籍战士说,乞丐最头痛,罚款没得,收容,给碗饭吃。加之蓬头垢面臭烘烘的,谁都不愿理他们。城市管理人员也有同感。于是,乞丐就我行我素起来。

在寺庙商店乞讨好发“财”

西丽湖公园的西丽塔下,有一座小庙,游人如织,善男信女不少。即使不信佛的靓女俊男也想在此讨个吉利。于是,乞丐云集在那里。

瞭望哨

□文/黄钧

一、行业竞争。国有、民营的各大公司,以及外商对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资金投入连年增加。目前国有两家房地产公司,中外合资企业已达4000余家,外商独资房地产企业达800家,同行间竞争白热化。

二、市场竞争。现在除了开发商外,还包括房地产中介、咨询、评估、代理、法律、公司、策划、广告、媒体等行业,无一不行业都要从中分一杯羹。

三、资金竞争。国家的住宅产业开发尚处热点,在大力推广中,政府的政策对住宅产业开发的资金调控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。

四、服务竞争。当前房地产营销由原来的坐等客上门,发展到出门找客、服务上门,并且增多服务范围、方式、内容等。

五、时间竞争。在同等条件下,时间短、收效快的项目,才有利可图,开发商不得不看重。

六、人才竞争。房地产业为了发展,愈来愈多地重视和重用人才,由单纯利用本地、本单位人才发展到向各地大中院校、科研院所聘请“能人”。

七、信誉竞争。“利从信誉中来”,房地产业由原来的客户登门提意见,甚至上诉法院,变为主动征求客户意见,并进行跟踪服务。

八、宣传竞争。房地产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愈发重视形象,并逐步向集艺术、新奇、娱乐于一体的宣传方向发展。

九、科技竞争。伴随着科技的推广,大批高、新、精的技术在开发企业中得到广泛应用。

十、信息竞争。房地产企业要有一支信息专业队伍,利用计算机技术和现代通讯手段,建立房地产业信息网。

春节,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,毛泽东也忘不了这个节日,并留下了许多佳话。

毛泽东在湖南韶山度过了他的少年时期。在这里,他不但吸收了儒家奋发向上、兵家尚武精神,而且从父辈那里接受了乡风民俗,尤其是春节,他是一点不会忘记利用这个节日和部下联络感情的。

污受贿、侵占国家财产数额,应依法判处死刑,但周北方供出了30多个亿的外逃线索,因此立功表现换来东死刑缓期执行。设想,如果周北方不被捕,这30多亿元的外逃款结局又该如何呢?

资本外逃是一个黑洞,不堵塞这个黑洞,社会主义大厦总有一天要被蛀虫蛀空。如果到了王熙凤说的“外面的架子还撑着,内里却空了”这步田地,就将造成难以挽回的巨大损失。对资本外逃,全社会都应引起关注:国家有关部门和企业应采取强有力的措施,使资本运行步入科学管理的轨道,堵塞这一黑洞。特别是处理资本外逃案件决不能单纯看成是经济案件,要把它作为反腐败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,严厉打击,绝不能手软。

著名军旅歌手徐良涉嫌杀人的消息传开后,闻者无不震惊。对于这个12年前的英雄、明星的“裂变”,人们众说纷纭。

西安音乐学院65岁的声乐教授薛明在得知他的得意门生徐良斗殴致人死亡的消息后,曾急电北京的学生询问究竟。原来那些曾与徐良过从甚密的校友,这几年来已不大与徐来往了。“徐良有新的圈子”,“他满天飞,要做生意。”薛教授说,他从来教学生要守得住寂寞,不要没有掌声就受不了;在徐良名声达到顶峰时,他曾这样婉婉地奉劝过徐良:“做了名人,再当个普通人,更难。不知他是否知道我话中的含意。英雄的辉煌时期一过,有多少人还能让人记住?徐良,很多年轻人已

忘记了,像他这样敏感的人受不了。”

北京一位文艺界人士说,徐的出事地点在海淀区某舞厅,“这些年他不参加演出,一直在社会上‘飘’。”有消息说,“近几年,徐良对自己的要求不严,纪律松弛,自由散漫,长期不在单位,也不知道他在外面干什么。”而徐良昔日的同学则明确地说:“我们相处很久,话越不投机,我们是搞专业的,他则靠口生意经,什么开饭店,开舞厅,搞卡拉OK包房什么的……”

1987年曾因披露徐良在上

海一公益演出中“索要出场费”而被徐良送上法庭、最终败诉的《上海文化报》的总编辑朱士信说,虽然与徐良有那么多特殊关系,但我还是为他惋惜。我觉得这几年徐良处在一种“失重状态”。战争的硝烟已远去,和平年代

海一公益演出中“索要出场费”而被徐良送上法庭、最终败诉的《上海文化报》的总编辑朱士信说,虽然与徐良有那么多特殊关系,但我还是为他惋惜。我觉得这几年徐良处在一种“失重状态”。战争的硝烟已远去,和平年代

海一公益演出中“索要出场费”而被徐良送上法庭、最终败诉的《上海文化报》的总编辑朱士信说,虽然与徐良有那么多特殊关系,但我还是为他惋惜。我觉得这几年徐良处在一种“失重状态”。战争的硝烟已远去,和平年代

海一公益演出中“索要出场费”而被徐良送上法庭、最终败诉的《上海文化报》的总编辑朱士信说,虽然与徐良有那么多特殊关系,但我还是为他惋惜。我觉得这几年徐良处在一种“失重状态”。战争的硝烟已远去,和平年代

海一公益演出中“索要出场费”而被徐良送上法庭、最终败诉的《上海文化报》的总编辑朱士信说,虽然与徐良有那么多特殊关系,但我还是为他惋惜。我觉得这几年徐良处在一种“失重状态”。战争的硝烟已远去,和平年代

海一公益演出中“索要出场费”而被徐良送上法庭、最终败诉的《上海文化报》的总编辑朱士信说,虽然与徐良有那么多特殊关系,但我还是为他惋惜。我觉得这几年徐良处在一种“失重状态”。战争的硝烟已远去,和平年代

海一公益演出中“索要出场费”而被徐良送上法庭、最终败诉的《上海文化报》的总编辑朱士信说,虽然与徐良有那么多特殊关系,但我还是为他惋惜。我觉得这几年徐良处在一种“失重状态”。战争的硝烟已远去,和平年代

众说纷纭话徐良

□文/双龙

人们那个年代往往失去记忆。徐良之所以能够成名,也正是那个年代的产物,他是因为那个年代的军人,他是一个大学声乐系的学生,这种种因素赋予他不同于普通战士的冲击力,一般人难以承受的……

新闻观察

□文/许家祥

随着柬埔寨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的下台,“红色高棉”的悲剧便成为定局,然而,他们的悲剧并非自今日始。早在1975年4月至1979年1月的红色高棉执政时期,这个悲剧就拉开了帷幕。

柬埔寨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,红色高棉政权却宣扬“15年实现全国现代化”,并提出“超跃进”的口号,强迫社员每天劳动15小时,没收老百姓的自行车、缝纫机、手表、戒指,不准私人养家畜和种树。因为这些东西是“资产阶级象征”。各家的炊具、粮食一律上交,统统吃大食堂,全国无邮政、无货币、无商品,私人写信得托熟人辗转递送,一年半载也不一定收到。市场上则实行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办法,禁止青年自由恋爱、婚姻组织作主,实行“配给制度”,按阶级成分及合作社社员等级“指定”。其理论依据是:党是全国大家庭的家长,既然把一切献给党,婚姻当然由党作主。(见第9期《看世界》)

人间写真

这是一个令人揪心的悲剧

——13岁的少女小莲被36岁的安徽农民张某从上海带回家乡做了三年的“老婆”。元旦前夕,上海市长宁区法院一审判决张某有期徒刑13年。然而,此案的悲剧却留给了人们太多的思考。

去年5月20日,当蓬头垢面的小莲被打开上海市西区的家门时,随着一声“妈妈!”的喊声,失踪一年的女儿又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。其母亲亲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,望着眼前浑身脏脏的女孩子,万份惊讶久久站立不敢相认……

事情还得追溯到1996年6月6日,那天下午,13岁的小莲在家闲得无聊,便独自一人外出玩耍,经过种德桥路一空旷的运垃圾地时,生性好动的她爬上2楼,突然瞧见有一男子在房上睡觉,小莲刚转身想走,正巧该男子醒来叫住了她,招呼她进来玩。于是小莲与他闲聊起来。该男子叫张某,今年36岁,是安徽来沪打工的。闲谈之后,张即叫小莲躺在摊在地

拜、舞会、演戏、扭秧歌。1941年春节期间,中央机关一连演了几晚戏,附近许多乡亲也赶来看。有一晚,毛泽东走进戏场之后,发现干部战士都坐在前面,老乡们都坐在后面,最前面还给中央首长留下了两排空位。毛泽东进来以后,当场说:“同志们!老乡们生产都很忙,看戏机会很少,而且跑很远的路,不容易呀!我们应该让他们坐在最前面看戏。”说完,自己就带头坐到了最后面,干部和战士也跟着毛泽东到了后面。老乡们很感动,一再谦让,还是被毛泽东劝到了最前面。几十年来,这件事一直成了延安人民的美谈。

毛泽东一到春节,那怕再忙,他都要亲自去慰问身边的工作人员,同他们握手,向他们拜年。而且总是和蔼地说:“你们长年累月为我们服务,连春节也很少休息,你们辛苦了!”接着一个个问寒问暖,家里情况怎样?家属生活有没有困难?并请转达他的节日问候和祝贺。

□文/解玉泉

为老区人民服务的。”

笔者问他会不会写字,他答会写自己的名字。递过采访本请其签名留念,他翻过一张白纸,在已记有采访笔录的那面纸上挥手下写“年广九”三个字,交给同他的合作朋友,方知他从不在白纸上签名,害怕别人写假借据坑他。鬼精!

徐良说:“计划经济时代,人们思想不开窍,对个体经济存有戒心。现在好了,十五大开过了,有邓小平理论指引,什么也不怕了。我这个人不爱本,一没文化,二是不讲技巧,得罪人。但我对干事业很有信心。有人说我坐牢,我说是养家,没有那次养家,怎有第二次出山?”

谈到目前的经营状况和具体的经济指标,徐良狡黠地一笑说:“我不能告诉你产量、产值、利润,不是不够朋友,我说我只有一分钱,你相信不相信?真的不能讲,我被人家害了怎么办,不安全。”徐良不傻!

问其家庭情况,他也是不着边际,说:“儿子是中国人民的儿子,四海都是我的家。”在笔者轮番逼问下,他终于露出了口风。与一般传媒报道他只有两个儿子不同的是,徐良说他一共有五个儿子,老大老二一个叫金宝、一个叫年强,和他分庭抗礼,独自搞徐子瓜子;三儿子年彬,正在南京读研究生;四儿子年卫26岁,在武汉工作;最小的儿子年金龙今年11岁,现在芜湖,但不在他身边。

关于那位年轻的女大学生妻子,徐良不愿提及。不知他在1985年那场轰动一时的离婚案中,徐良在离婚时所表现出来的痴狂到哪儿去了?就为了将自己融入社会主流,显示自己的文化品味、爱情追求,他不惜与老婆离婚,与徐良的“老婆”在世上是朋友,死了才叫老婆,到现在我还为她戴孝。”说着,他举起酒杯,露出里面白色的孝裤,他说一年四季他都穿着。前一阶段有传媒报道说:徐良出狱后曾去深圳找过已当老板的那个女大学生老婆,她对徐良出奇的冷漠,只同意让

新闻人物

□文/谷怡 郑岁寒

徐良说:“计划经济时代,人们思想不开窍,对个体经济存有戒心。现在好了,十五大开过了,有邓小平理论指引,什么也不怕了。我这个人不爱本,一没文化,二是不讲技巧,得罪人。但我对干事业很有信心。有人说我坐牢,我说是养家,没有那次养家,怎有第二次出山?”

热门报道

□文/王夫子

1993年9月4日,在北京举行的国际广播电视设备展览会上,安徽现代研究所推出了世界第一台视盘机——“万燕”VCD。从那时起,中国VCD市场就从没有过一刻平静。厂家竞相上马,生产恶性膨胀,价格起伏跌宕。1997年11月8日中央电视台广告竞标活动中,VCD可谓出尽了风头,其中“科技类”产品中,7种产品竟有6种是VCD,爱多VCD还夺得此次竞标的标王。

1994年,全国VCD生产商仅安徽万燕电子系统有限公司一家,产量仅2万台。1995年,全国VCD产量增至60万台;1996年,突破600万台;1997年,VCD生产厂家达到600多家,产量达1000万台,今年预计直超2000万台大关。目前,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VCD消费市场,产量占世界90%以上,可以这么说,VCD将中国家电业带到了世界前列。

生产VCD投资小,工艺简单,但相对利润很高,加上市场潜力巨大,因此,在巨额利润的诱惑下,国内企业纷纷上马,仅南方某沿海城市就有VCD生产厂家上百家,而广东某县一个多月内便冒出了几十家VCD组装厂。与此截然相反的是,中国VCD“鼻祖”——安徽万燕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由当初100%骤降至2%以下。

据悉,今年全国VCD总需求量约为500万台左右,也就是说,国内市场消费量只占总产量的一半。1997年6月,广东的爱多推出了“阳光行动A计划”,率先降低VCD价格,以争取最大的市场。爱多影响,国内的所有VCD生产厂家不得不紧步后尘,也采取相应的降价对策,从而在全国引发了一场空前的VCD价格大战。

然而两个月后,也就是在当年的8月26日,新科、万利达就开始在河北承德市降价;在南方一些省城,万利达三碟机的价格由每台的1580元提至1980元,新科VCD的零售价也上涨了50到80元,爱多VCD也有不同幅度的提价。在这场不见硝烟的大战中,一些生产规模小、技术能力差的企业顿生“四面楚歌”之感,为了保住生存的饭碗,有的开始不择手段,粗制滥造或偷工减料,有的干脆假冒名牌产品,企图鱼目混珠。日前,中国电子部科技质量监督处对全国VCD生产企业进行了一次严格的检测,仅有先科、新科、万燕、爱达、步步高、松立、熊猫、厦新8家VCD产品质量过关。

就在国产VCD大战硝烟弥漫之时,一些国外品牌也纷纷挤进了

目前,大陆演员拍国产片酬最高的几位,每部影片的片酬要价都在几十万。电视剧《武则天》女主角的片酬据说已创中国电视剧之最高,达200万人民币。但时隔不久,这一最高记录就被刚刚打破,她在由香港导演陈可辛执导、陈凯歌执导的电影《风月》中获30万美元的片酬,创下了迄今为止中国明星片酬之最。

纵观国内影视剧公司电视剧片酬,一般是一集2000元,尽管与几年前的三百元已不可同日而语,但这在影视中只能算是“小巫”,就连一些“大腕”级的电影演员和小品相声演员到电视剧“玩票”,每集也要五六千,从海外归来的身份则更高。据一部30集的电视剧连续制片人介绍,在剧组经费十分紧张的情况下,“某某一人就拿掉60万”。

大陆演员片酬为何在短短几年间便翻了十几番?圈内人士认为,随着国门的洞开,“洋风”劲吹,这是因为受了“洋规则”影响使然。在合拍片中,大陆演员的片酬同港台同行有着天壤之别,收入的巨大反差便使大陆国内影视剧圈哄抬酬金之风。再加上近几年来一些从国外镀金归来的演员纷

纷要求片酬与国际接轨,由此便为片酬飞涨推波助澜。明星们说:“在国外,红星片酬高达几十万甚至上千万,而我们不过十几万、几十万与国际接轨还差得远呢!”

从表面现象来看,片酬似乎只是钱的问题,但它又决不仅仅是钱的问题,它更代表着演员的身价,使许多注重面子的演员宁肯在家呆着,也不愿在低片酬的影视剧剧中任角色。甚至有的新秀为了跻身明星地位,也敢于中连续刊登了一些明星参加赛车、骑马、踢球、游泳等体育活动的情况,结果很快招致一批读者的严厉批评。为什么要用宝贵的版面刊登这些人的“吃喝玩乐”?当然,在影视圈中,淡泊名利的还是大有人在的。拍《满过男人河的女人》时,九位老演员的片酬都很低,在大山里拍戏又十分艰苦,但老人们依然非常认真,非常投入。他们的艺德,折服了几位青年演员。这几位青年虽然很看重,片酬不高,可是拍在大山里实实在在地拍了200多天戏。该剧在全国各地播放时,收视率特别高。

作为一个演员,若是一味不顾国情与国外攀比收入,为了赚钱而丧失了起码的人格和艺德,那么不仅他的艺术生命是肯定长不了的,而且将遭到观众的唾弃。

“天价”片酬悠着点

□文/尹云

狮子大开口:“非某某万不拍。”有的制片人很聪明,采用明暗之法投其所好,对外宣称每集一万,暗地里一两千也就打发了。双方落得皆大欢喜。

但有些演员缺乏最起码的艺德,为了钱不惜做出未过河便拆桥的事来。一位制片人抱怨说:演员正拍着戏突然就不拍了,酬金要加码,弄得我不得不连夜借钱,还有干脆走人,连招呼都不打,剧组一天得花几万元干耗着。合同对他们来说等于一纸空文,找其索赔,“要钱没有,要命有一条”,令人无可奈何。一位资深制片人向中央戏剧学院去挑演员时,一位尚未毕

来,抢滩中国市场。韩国的三星、LG、日本的松下、东芝、索尼、先锋、健伍等品牌欲在中国这个广大的家电消费市场分得一杯羹。这些外国品牌在中国市场的售价一般为2500元以上。因为洋人搬走了中国人迷信原装进口的心里。然而,这次较量胜的不是洋货,而是地地道道的国产产品。洋人对此大惑不解,中国消费者又怎么?

其实,国产VCD无论在质量上还是价格上,都是深得中国消费者信赖的。中国、日本、韩国等VCD所用的CL48X系列解码芯片,90%以上来自于美国的高斯格公司。因此,整机性能、质量都差不多,进口机只能在生产工艺上稍稍领先一步,但进口机却忽视了碟片质量的现实,没有在机芯物理参数的动态调整和系统软件上,作相应的处理,其纠错能力明显不如国产机强。进口机的生产成本,运输成本加起来,使得洋机的售价比国产机要高,在价格大战中,国产机获胜是很自然的事。此外,国产机在销售手段上也比进口机灵活,目前国内市场上的国产VCD畅销品牌在销售时,大多都随机赠送一支话筒或几碟VCD碟片,这就使得消费者省掉了一笔开支。据悉,进口机在中国市场的份额已由过去的70%降至10%以下,而国产VCD已占到市场份额的近70%。

就在VCD大红大紫的时候,DCD突然横空出世。

VCD属压缩技术光盘,而DCD则是数字技术光盘,其技术性更比VCD要高得多。DCD可任意改变画面的纵横比,选择不同的形式使宽银幕电影片变得丰富多彩。它还具有“多语言”功能,有多达8种语言的配音及多达32种文字的字幕。此外,DCD还可以收录不同的版本让用户观看,也可以让用户将几个不同的故事组合成一个新的故事。此外,它还具有更多角度的功能,用户可选择不同角度拍摄的画面。DVD无论是单面单层还是双面双层,其容量都是大于传统VCD的。其单面单层存储容量是VCD的7倍,双面双层的存储容量则是VCD的25倍以上。

DVD自1994年正式面世以来,新闻媒体对其宣传可以用“火爆”来形容。但实际上,它并非像人们所预测的那样走红,因为单是DVD机本身的价格就不菲,若加上AC-3功放,价格在2.5万元左右,普通百姓恐怕消费不起。若没有专门的软件是无法发挥其优势的。此外,还需配备36英寸的高清晰度彩电(HDTV)才能更充分地表现出“贵族”风范,而一台HDTV的价格至少在7-8万元之间。正因为这样,DVD淘汰VCD将不是一日之功,有专家预测,VCD至少还可以红火5年以上。

有专家警告说,VCD若不尽快整顿,将来可能又会重蹈彩电业的覆辙。因此,专家呼吁给VCD热降降温。

下,他终于露出了口风。与一般传媒报道他只有两个儿子不同的是,徐良说他一共有五个儿子,老大老二一个叫金宝、一个叫年强,和他分庭抗礼,独自搞徐子瓜子;三儿子年彬,正在南京读研究生;四儿子年卫26岁,在武汉工作;最小的儿子年金龙今年11岁,现在芜湖,但不在他身边。

关于那位年轻的女大学生妻子,徐良不愿提及。不知他在1985年那场轰动一时的离婚案中,徐良在离婚时所表现出来的痴狂到哪儿去了?就为了将自己融入社会主流,显示自己的文化品味、爱情追求,他不惜与老婆离婚,与徐良的“老婆”在世上是朋友,死了才叫老婆,到现在我还为她戴孝。”说着,他举起酒杯,露出里面白色的孝裤,他说一年四季他都穿着。前一阶段有传媒报道说:徐良出狱后曾去深圳找过已当老板的那个女大学生老婆,她对徐良出奇的冷漠,只同意让

徐良说:“计划经济时代,人们思想不开窍,对个体经济存有戒心。现在好了,十五大开过了,有邓小平理论指引,什么也不怕了。我这个人不爱本,一没文化,二是不讲技巧,得罪人。但我对干事业很有信心。有人说我坐牢,我说是养家,没有那次养家,怎有第二次出山?”

谈到目前的经营状况和具体的经济指标,徐良狡黠地一笑说:“我不能告诉你产量、产值、利润,不是不够朋友,我说我只有一分钱,你相信不相信?真的不能讲,我被人家害了怎么办,不安全。”徐良不傻!

问其家庭情况,他也是不着边际,说:“儿子是中国人民的儿子,四海都是我的家。”在笔者轮番逼问下,他终于露出了口风。与一般传媒报道他只有两个儿子不同的是,徐良说他一共有五个儿子,老大老二一个叫金宝、一个叫年强,和他分庭抗礼,独自搞徐子瓜子;三儿子年彬,正在南京读研究生;四儿子年卫26岁,在武汉工作;最小的儿子年金龙今年11岁,现在芜湖,但不在他身边。

关于那位年轻的女大学生妻子,徐良不愿提及。不知他在1985年那场轰动一时的离婚案中,徐良在离婚时所表现出来的痴狂到哪儿去了?就为了将自己融入社会主流,显示自己的文化品味、爱情追求,他不惜与老婆离婚,与徐良的“老婆”在世上是朋友,死了才叫老婆,到现在我还为她戴孝。”说着,他举起酒杯,露出里面白色的孝裤,他说一年四季他都穿着。前一阶段有传媒报道说:徐良出狱后曾去深圳找过已当老板的那个女大学生老婆,她对徐良出奇的冷漠,只同意让

复

□文/谷怡 郑岁寒

徐良说:“计划经济时代,人们思想不开窍,对个体经济存有戒心。现在好了,十五大开过了,有邓小平理论指引,什么也不怕了。我这个人不爱本,一没文化,二是不讲技巧,得罪人。但我对干事业很有信心。有人说我坐牢,我说是养家,没有那次养家,怎有第二次出山?”

复

□文/谷怡 郑岁寒

徐良说:“计划经济时代,人们思想不开窍,对个体经济存有戒心。现在好了,十五大开过了,有邓小平理论指引,什么也不怕了。我这个人不爱本,一没文化,二是不讲技巧,得罪人。但我对干事业很有信心。有人说我坐牢,我说是养家,没有那次养家,怎有第二次出山?”

复

□文/谷怡 郑岁寒

徐良说:“计划经济时代,人们思想不开窍,对个体经济存有戒心。现在好了,十五大开过了,有邓小平理论指引,什么也不怕了。我这个人不爱本,一没文化,二是不讲技巧,得罪人。但我对干事业很有信心。有人说我坐牢,我说是养家,没有那次养家,怎有第二次出山?”

徐良说:“计划经济时代,人们思想不开窍,对个体经济存有戒心。现在好了,十五大开过了,有邓小平理论指引,什么也不怕了。我这个人不爱本,一没文化,二是不讲技巧,得罪人。但我对干事业很有信心。有人说我坐牢,我说是养家,没有那次养家,怎有第二次出山?”

徐良说:“计划经济时代,人们思想不开窍,对个体经济存有戒心。现在好了,十五大开过了,有邓小平理论指引,什么也不怕了。我这个人不爱本,一没文化,二是不讲技巧,得罪人。但我对干事业很有信心。有人说我坐牢,我说是养家,没有那次养家,怎有第二次出山?”

徐良说:“计划经济时代,人们思想不开窍,对个体经济存有戒心。现在好了,十五大开过了,有邓小平理论指引,什么也不怕了。我这个人不爱本,一没文化,二是不讲技巧,得罪人。但我对干事业很有信心。有人说我坐牢,我说是养家,没有那次养家,怎有第二次出山?”

徐良说:“计划经济时代,人们思想不开窍,对个体经济存有戒心。现在好了,十五大开过了,有邓小平理论指引,什么也不怕了。我这个人不爱本,一没文化,二是不讲技巧,得罪人。但我对干事业很有信心。有人说我坐牢,我说是养家,没有那次养家,怎有第二次出山?”

徐良说:“计划经济时代,人们思想不开窍,对个体经济存有戒心。现在好了,十五大开过了,有邓小平理论指引,什么也不怕了。我这个人不爱本,一没文化,二是不讲技巧,得罪人。但我对干事业很有信心。有人说我坐牢,我说是养家,没有那次养家,怎有第二次出山?”

徐良说:“计划经济时代,人们思想不开窍,对个体经济存有戒心。现在好了,十五大开过了,有邓小平理论指引,什么也不怕了。我这个人不爱本,一没文化,二是不讲技巧,得罪人。但我对干事业很有信心。有人说我坐牢,我说是养家,没有那次养家,怎有第二次出山?”

徐良说:“计划经济时代,人们思想不开窍,对个体经济存有戒心。现在好了,十五大开过了,有邓小平理论指引,什么也不怕了。我这个人不爱本,一没文化,二是不讲技巧,得罪人。但我对干事业很有信心。有人说我坐牢,我说是养家,没有那次养家,怎有第二次出山?”

徐良说:“计划经济时代,人们思想不开窍,对个体经济存有戒心。现在好了,十五大开过了,有邓小平理论指引,什么也不怕了。我这个人不爱本,一没文化,二是不讲技巧,得罪人。但我对干事业很有信心。有人说我坐牢,我说是养家,没有那次养家,怎有第二次出山?”